满汉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

——《通志堂经解》述论

刘德鸿

This paper expressed the author's opinion of the redacting rights, redcating background and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ong zhitang JingJie' (The Classic Series of Tong Zhitang).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viewpoint, this series was the product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the thought of Emperor Kangxi was its guiding principle. Xu Qianxue was the designer and chief editor, who decided on the selected booklist, did editting and proofreading. Nalan Xingde undertook the work of collecting rare books, collating, writing a few prefaces and postcripts, and bearing the expense for printing the series. In short his contribution was vital to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This series was an achivement of Man—han copperation in cultural realm.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expound the Chenzhu doctrine, offset the defects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lassical school, advocate loyalty and justice, and ask people to serve the Emperor with all their hearts. In the state of the violence of the Three Feduatory Rebellion, this series was helpful to relax the tense relation between Man—han ethnics, uphold national unity and stablize the public order.

《通志堂经解》是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丛书，汇集了唐、宋、元、明 137 种，另有先秦 1 种，性德自撰二种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经的注释，因此又称《九经解》。计《易》类 39 种 330 卷，《书》类 19 种 229 卷，《诗》类 11 种 140 卷，《春秋》类 35 种 459 卷，《三礼》类 12 种 384 卷，《孝经》类 4 种 4 卷，《论语》类 2 种 20 卷，《孟子》类 3 种 23 卷，《四书》类 8 种 135 卷，总经解 7 种 64 卷，共计 140 种 1788 卷。可谓规模宏大，卷帙繁富，且多传世所罕见者，为研究经学难得的重要史料。但对《通志堂经解》的编校权，从它面世直至如今，都有人持怀疑以至否定态度。因此，笔者拟从其编校权谈起，然后再谈其编校背景及思想倾向。

一、编校权问题

如此鸿篇巨制，冠以当时年方二十左右，虽然倾慕汉族传统文化，对儒家经典兴趣极浓，但毕竟根柢尚浅，濡染不久的满洲贵族青年纳兰性德藏书室通志堂之名，署名纳兰成德（性德原名）辑，不能不使人对其编辑校定者产生疑问，并由此生发出种种议论，说纳兰性德根本没有出力，是徐乾学为讨好明珠让他挂名的，他是有名无实的掠美攘褕者。特别是乾隆以皇帝之尊说性德"滥窃文誉"①之后，此说更甚。其中讲得最具体的是著名文人姚元之，说："《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指乾隆帝）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徐以其家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版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②。

这些记述，显然是不肯认真阅读徐乾学和纳兰性德有关著述而又胸怀成见的偏颇之言。只要认真披览一下徐、纳二人的说明，就可以明了他们各人所作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徐乾学在《通志堂经解序》中说《通志堂经解》的成书过程是："余兄弟家所藏本，复加校勘。便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季斧，温陵黄俞邰及竹垞家藏旧版书若干钞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门人纳兰容若，尤怂恿是举，捐金倡始，同志群相助成，次第开雕。经始于康熙癸丑，逾二年讫工，藉以表彰先哲，嘉惠来学。功在发余，其敢掠美！因叙其缘起，志之首简"。

由此可见，《通志堂经解》的底本，主要是来自徐乾学及其兄弟元文、秉义家所藏之书，并且已经作过校勘。又向朋友曹溶（字秋岳）、秦松龄（字对岩）、钱曾（字遵王）、毛扆（季斧）、黄虞稷（俞邰）、朱彝尊（竹垞）等著名文人及藏书家借了若干钞本，加以校勘，"厘择是正"，打算雕板行世，但由于资金筹措不易等原因，尚未付梓。纳兰性德得知后，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极力主张付诸实施，并且首先捐金（据说达四十万两）倡始，鼓动大家集资开雕。徐乾学在纳兰性德的推动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决定刻印这部丛书。纳兰性德也决没有掠人之美之意，在《经解总序》中回顾和论述了阐释经义的历史，讲到宋元解经之书时说："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误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间以启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所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钞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叙作者大意于各卷之首，而复述雕刻之意如此。"比较纳兰性德的《经解总序》和徐乾学的《经解序》，就会发现他们师徒二人不仅志趣相投，徐乾学于家藏及朋友处借得解经之书，"谋雕版行世"时，纳兰性德也托朋友"购诸藏书之家"，不谋而合，而且秦松龄、朱彝尊等是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只是徐乾学"以文章声气盖一世，海内名士奉为宗工"③，活动范围更广，朋友更多，从藏书家手中借阅抄本更加便利而已。徐乾学"谋雕版行世"，纳兰性德"请捐资经始"，由他们两人倡议主持，在朋友们的赞助帮助下，经过共同努力，使得丛书顺利刊刻。书名冠以"通志堂"，即寓意志趣相通，也就是徐乾学所说的："同志群相助成"之义。这些志趣相通的人包括满汉两族，就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鉴于此，性德原名"花间草堂"的藏书室，从此又名通志堂，表明他愿意与汉族文人通力合作，为维护民族团结奋斗一生的志向。

纳兰性德不仅是《通志堂经解》的积极倡议和热心赞助者，而且也亲自参加了校勘，并撰写了 71 种经解的 64 篇序跋。无可讳言，这 71 种经解的校勘和 64 篇序跋的写作，未必都由性德

亲自动手，但不能以此全盘否定性德的校勘权和著作权。他的校勘，是在徐乾学指导下进行的。徐引导点拨他研习儒家经典，必然要讲授经义，也不会不让他阅读解经之书。而解经之书"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又不能不校勘。于是边读边校，在校中加深理解，成为徐乾学向满族青年传授儒术，纳兰性德向汉族学者学习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方法。性德说他对诸家经解"晓夜究研，以副明训"，"俾得卒业焉"，其中不少时光当用在参校核勘上了。

参校核勘之外，性德也撰写了大批序跋。例如《周易玩辞序》中说，其书"数百年来，传本渐稀。近得善本于吾师东海先生（指徐乾学），因重校而梓之。"又如《卫氏礼记集说序》中谓，"是书钞帙颇有缺轶，然不碍其可传。因从东海夫子请，归校而授梓。"作者的语气笔意，非性德莫属，不可移置他人。纳兰性德在《永嘉蔡氏论语集说序》中说："是书宋《艺文志》不载，诸家藏书目俱未收，予乃购得之，幸矣。"

这些记载说明，性德不仅是《通志堂经解》的首倡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搜集者和校勘者之一。

当然，搜集和校勘《通志堂经解》这样规模宏大，缥缃繁巨的丛书，不可能由纳兰性德一人单独承担，也不可能仅仅是性德和徐乾学两人合作。其大致情况当是徐乾学负"主编"之责，确定入选书目及其底本，并拿出自己家藏经解著作和亲自校订者，还对从曹溶、钱曾、黄虞稷等藏书家手中借来的抄本进行了订正厘定，发挥了核心和总裁的作用。纳兰性德则是在徐乾学的指导下参加搜集和校勘入选解经著作，撰写序跋，并负责捐资刻印事务，参与了各个环节的工作，亦发挥了董其成的作用。参与校勘的虽然还有顾湄、秦松龄、朱彝尊等人，但徐乾学和纳兰性德所起的作用非他们可比，"经解"的编校刊印，主要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是清初满汉关系史上的一个范例。冠以"通志堂"之名，署名"纳兰成德辑"，固然有徐乾学逢迎讨好明珠的隐衷，但也有鼓励满族青年迅速成长，促进纳兰性德早日成才的成分。一些人没有认识到后者，徒事攻讦，显然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纳兰性德于"经解"的辑校刻印作过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能说他是滥窃文誉，掠人之美的托名者。

乾隆帝诋毁纳兰性德，是因为性德之弟揆叙是其父雍正帝的政敌、康熙帝第八子允祀的有力支持者，曾竭尽全力拥戴允祀谋取皇位。史载允祀幼时由明珠的堂侄女、康熙帝的惠妃叶赫纳喇氏抚养，揆叙与允祀素来熟识相结。康熙帝废黜皇太子允礽后，"召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④，"示意诸大臣书'八阿哥'三字入奏"⑤。允祀争夺皇位失败，乾隆帝之父胤禛登基为雍正帝后，说揆叙"要结允祀等同为党援，肆无忌惮，日夜谋为造作无稽之谈，转相传达"，"此朕与阿灵阿、揆叙不共戴天之恨也"，命将其时已死的揆叙墓上碑文磨去，改镌"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以正其罪，昭示永久"⑥。阿灵阿之墓碑，则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⑦。

雍正帝对揆叙有"不共戴天之恨"，其子乾隆帝自然也对揆叙怀恨在心。如果揆叙拥戴允祀成功，则不仅雍正帝会身首异处，乾隆帝也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将对揆叙的怨恨扩散到对性德的丑诋。皇帝的好恶公诸于世，自然有人群相附和，姚元之等人诋毁性德，当作如是观。

纳兰性德屡遭诋毁丑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父明珠和其师徐乾学相继被罢黜失势后，政敌的趁势攻讦，牵连到性德。凡是对明珠、徐乾学及他们的家人、门徒的贬抑诋娸之词，不论真伪，政敌都乐于传播。当时社会上重视经学儒术，他们便从《通志堂经解》入手进行诋毁，尽管从来不知道《经解》是何等模样。当然，其中也有不明真相而随声附和者。

虽然如此，但今天看来，《通志堂经解》这样的鸿篇巨制，以纳兰性德一人署名是有缺陷的。

一则容易使人产生疑窦，给仇家以借口。二则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至少不应该把负主编之责的徐乾学之名排除在外。三则令人难以看出满汉合作的意蕴。但在封建社会，社会地位高也就学术水平“高”，官大也就“学问大”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也没有必要以此深责纳兰性德。

二、编校背景

大型学术著作的编写，必须高水平的学者长期合作，不仅耗费时日，需以巨资作后盾，而且更需要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政治形势违迕背离，是不可能成功的。《通志堂经解》的编写刻印，既是清初政治需要的产物，更是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满汉合作进行传统文化的总结，推动中华文化事业繁荣的一个范例。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则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把儒家经典当作研究对象的学问，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经学发展到宋代，以附会经义而说天人性命之理，故称“理学”。又因理学家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被称为“道学”。

理学或道学改变了唐以前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重实证而轻议论的“汉学”学风，以义理论证伦常，宣扬纲常名教，陈说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其存在的根据，因此备受封建统治阶级的青睐而成为显学，进而变为官方学术和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但学术上分为程(颢、颐)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经历元代到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心即是理”⑧，为学以“发明人之本心”⑨为主的学说，提出“致良知”说，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⑩。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被人们称为“心学”。心学以富有思辨色彩和哲理而一度作为新创的学说广为流行，风靡朝野，但也将理学阐释义理主观片面，随意发挥，惯作凿空之论的弊病发展到极限。一些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空谈侈论代替治学解经成为风尚，甚至达到了“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⑪，将国家安危抛到九霄云外的程度。

明清两朝的政权更迭，对汉族知识分子震动很大，其中一部分人痛定思痛，对明朝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⑫，而“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游谈”⑬；“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因而酿成“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⑭的惨痛后果；“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⑮，导致了明朝败亡。他们针对理学的“空谈误国”，提倡“明学术，正人心”⑯，把学术研究与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实际，经世致用。

经世政用的倡导除摒弃明代理学空疏迂阔学风外，更重要的是以总结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立论，包含着明显的不与清朝合作的内容，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意识。他们所说的“致用”，就不仅是学以修身，其主导思想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⑰。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⑱，应当“严夷夏之防”以“匡扶社稷”⑲，甚至力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⑳，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新近入关，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

今天看来，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理学的空谈心性，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他们所说的“严夷夏之防”，也不无历史上大汉族的消极思想因素。但由于清初统治者无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习俗差异，在汉族居住区严厉推行圈占房地、剃发易服等民族高压政策，加重了汉人民族心理上的隔阂，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汉族儒生倡言“严夷夏之防”，还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清朝入关后汉族难以服帖，社会秩序长期不能稳定，是与民族意识壁

垒的存在，民族感情的鸿沟难于填平有很大关系的。民族心理上的隔阂，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寻求一种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以确定大家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用新的文化政策消融民族心理上的隔阂。

顺治年间战争频仍，戎马倥偬，很少顾及文治，文化政策沿袭明代旧制，没有来得及作适应清朝的调整，这一课题便落到了年轻的康熙皇帝头上。

康熙帝鉴于顺治时虽然修复太学，进行了科举取士，但一则顺治帝早逝后鳌拜等满族保守势力以反对"渐习汉俗"，恢复"淳朴旧制"为由出现了反复；二则兴学校、行科举虽然为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合作的有效策略，但仅靠这些政策显然不能统一社会思想，形成维系社会各界的内聚力，实现国家的久治长安。为了寻找统一社会思想，并以之形成知识界以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争取社会各界的合作，康熙帝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努力学习儒家学说。

清初汉族儒生抨击理学的空疏，主要是针对陆王的心学而发的。康熙帝儒学观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熊赐履，就一再在他面前表示："臣读孔孟之书，学程朱之道"㉑，并反复向他讲解朱熹学说。在熊赐履等人的引导影响下，康熙帝摒弃了明末盛行的陆王心学，选择了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理论作为维系知识分子以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康熙帝亲政伊始，就接受了汉人礼部侍郎黄机的建议，恢复了一度废止的以朱熹等人传注为准的八股文取士制度，表达了以朱熹学说作为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合作的思想武器的意向。康熙九年(1670年)，又颁布了贯穿朱熹学说的"圣谕十六条"作为治国纲领，"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㉒，进一步向全社会表明了以程朱理学作为国家久治长安内聚力的决心。紧接着，他又重开经筵日讲，举行经筵大典，除熊赐履外，任命崇尚朱熹学说的黄机、冯溥、王熙、徐元文等汉族大臣和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傅达礼、折库纳、喇沙里等满族官员充任经筵讲官，进一步学习儒家经典，讲求朱熹理学学说。一再宣称："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㉓。同时又提出融程朱理学于传统经学之中，把"明理"与"通经"结合起来，以经学济理学不逮的观点，反复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㉔，"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㉕？明确地表达了提倡研究经书，有意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学术的思想。

康熙帝的这种思想，纳兰性德之父明珠是领悟知底的。明珠除参与朝廷重要举措的策划和执行外，还于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内即开始充任经筵讲官，后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时，仍然兼任。见于记载的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二十二日与王熙一起进讲《书经》中"无教逸欲有邦一节"㉖。康熙帝好学多闻，不仅臣下进讲时"有疑必问"，"时有咨询"㉗，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㉘，不久即决定讲官进讲完毕，由他复讲，进而发展为听讲前"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㉙。明珠由此对康熙帝意欲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学术，用以统一社会思想，并倡导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的思想动态一清二楚。他当时与索额图的矛盾日深，自度在政治势力和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方面难以与索额图抗衡，为在朝中自固并谋求扩大势力，只有一方面顺承康熙帝意旨办事，尽心竭力地推行皇帝的思想统治策略，以争取君主的保护和简拔重用，另一方面想扬长避短，大量结交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吸收汉族传统文化、促进满汉文化融合，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超过索额图。

而编辑刊印《通志堂经解》，正可以达到这两方面的目的，因此他既赞同爱子纳兰性德出面倡导和组织编印，又慷慨解囊，以性德的名义在经费上大力资助，促其早日面世。

徐乾学当时虽然没有参加向康熙帝进讲的活动，但作为朝廷重臣，除对康熙帝的公开表态了如指掌外，对皇上在非正式场合表达的意旨趋向，也必然会时有所闻，况且其胞弟、国子监祭酒徐元文，也和明珠同时被任命为经筵讲官，并多次进宫向康熙帝进讲，他从徐元文口中，一定会得到不少信息。而他工于心计，通达权变，善于揣摩和迎合人主心意行事，经过反复推求思考，才将其“兄弟家所藏本，复加校勘”，并借曹溶、秦松龄等藏书家所收抄本“厘择是正”，“谋雕版行世”的㉚。

徐乾学决定和纳兰性德一起倡议主持刊刻《通志堂经解》，也是经过斟酌推敲的，大致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纳兰性德之父明珠当时甚得康熙帝倚重，是朝廷举足轻重的满族贵幸大臣，搞好和明珠的关系，无异于为自己在官场中站稳脚根并得到升迁搭了阶梯。

第二，以明珠的位尊权大和家财万贯，便于招徕校勘的文士和集资刻印。参加考订校勘工作的秦松龄、朱彝尊等人虽然是纳兰性德的朋友，但当时与性德结识未久，交谊还谈不上深厚，他们和性德“尤所契厚”，是参加校勘《通志堂经解》以后的事。当初其所以帮助性德搜集经解抄本并参与补苴罅漏，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明珠的面子上的。至于集资付梓，有记载说“侍卫（指纳兰性德）畀尚书（指徐乾学）四十万金”㉛。这个数目虽然在传闻过程中难免夸大，但纳兰性德拿出数目可观的金钱是可以肯定的。性德的金钱，自然也是明珠的家财。有性德提供巨额资金垫底，“捐金倡始”，再加上“同志群相助成”㉜，就使《通志堂经解》的校雠刻印经费有了保证。

第三，欣赏纳兰性德的才华和勤奋。徐乾学后来回忆说，性德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句出惊人，“余阅世将老矣，从我游者亦众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过之者也”㉝。虽然年轻，但拥书数千卷，“背诵经史，常若夙习”，“谈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老师宿儒有所不及”，而后又“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并且“性耐劳苦”㉞。纳兰性德具有如许优点，自然是很好的合作者，一同倡导和主持校雠《通志堂经解》的最佳人选了。

第四，徐乾学既是汉人，更是清朝大员，清朝政权稳定与否，不仅关涉到他头上的乌纱帽，而且涉及身家性命，因此他盼望社会稳定，希求缓和满汉关系。而纳兰性德忠于友情，“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㉟，交游甚广，在他周围团结不少名士。和性德共同倡导和主持《经解》的编印工作，不仅可以促进他们师生之间友谊的深化，而且通过这一举措可以团结更多的满（包括汉军）汉名流，在为繁荣中华文化事业而努力的过程中加深了解，消弭两族心理上的隔阂，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至于纳兰性德，有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得来的康熙皇帝的旨趣意向作指针，有家君在背后撑腰，有座主在前头引路，他又酷爱汉族传统文化，对儒家经典怀有极大兴趣，曾表示对宋元诸家经解“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㊱，自然乐于倡导和出面组织《通志堂经解》的校勘和刊刻事宜。同时，他也希望通过《经解》的编校刊印结识更多的汉族朋友，为缓和满汉关系，增强满汉两族友谊作出贡献。于是，由康熙帝出思想，明珠出钱，徐乾学出主意指导并亲自动手，由纳兰性德作组织工作并参与校勘，最后由其署名的《通志堂经解》便在封建社会极为尊严的“君亲师”联合发挥的作用下，经过校雠编辑而刊刻面世了。

三、思想倾向

了解了《通志堂经解》的编校背景，则其反映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从学术的角度宣传康熙帝思想的旨趣，是势所必然的了。

《通志堂经解》共汇辑刊印了阐释儒家经义的著作 140 种。纳兰性德的诗文集《通志堂集》收录了他为所辑各种经解写的 64 篇跋，其中有关《易经》的即达 27 篇，其次是关于《春秋》的 15 篇，与《尚书》相关的 9 篇，其他各经共 13 篇，加上《经解总序》，共 65 篇。从这 65 篇序跋中，不仅可以看出纳兰性德对便于发挥儒家"微言大义"的《易经》、《春秋》和《尚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可以清楚地窥见他辑印《通志堂经解》时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渗透于各篇序跋之中，有的明言直说，有的侧面烘托，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阐扬程朱理学、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表彰忠节三点。

(一)阐扬程朱理学

纳兰性德在说明编辑刊印《通志堂经解》旨趣的《经解总序》中，回顾了唐以前的解经状况后说："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群言，覃心阐发，皆圣人之微言奥旨……。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要其归趋，无非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斯固后进学者之所宜取衷也"。这就表明，纳兰性德尊崇的是程朱义理之学，欣赏的是阐发程朱学说的精深含义，拱卫臂助儒家经典的著作。这种"尊朱子"、"明义理"的主张，是纳兰性德刊印《通志堂经解》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贯穿于全书及其所写的序跋之中。

《通志堂经解》所选著作的作者，大多是程朱的门徒弟子或薪尽火传之人，这本身就说明了纳兰性德的思想倾向，再加上他在序跋中的反复申说倡导，就使这种思想倾向更加明朗显豁，引人注目了。如他说儒家经典深奥的含义不易通晓，治经者"本之以语孟之言，而归宿于紫阳(朱熹别号)晚年之定论"，则"如振裘而挈领者"㊲。为什么呢？因为"文公(指朱熹)著书名道，上继二程(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诸子之后，而集其大成，孔子后一人也"㊳。又说儒家经典经过朱熹订定，后学者"且当谨守，不必又多起疑论"㊴，阐释经义要"一以程朱为断"㊵。他最重视《易经》，在为阐释《易经》的著作所写的 27 篇序文中，都以程朱，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学说为指归，不仅有为朱熹之孙朱鉴辑录的《文公说易》写的序，称颂自朱熹《周易本义》出"而易道大明，久为天下学士所服习"㊶，而且对程颐所作的《易传》，也多所颂扬。他写的其他序跋，也多以《周易本义》和《易传》为归趣，不厌其烦地论说"古今言《易》者，奚啻数百家，然自注疏外，惟程朱传义，为世所传习"㊷。"自有两书，而四圣(指伏羲氏、周文王、周公、孔子)之精义微旨益著"㊸，"近代经学，至朱子而得其归"㊹。"《本义》阐象数理义之原，示开物成务之教"，"足以济生人之事"㊺。并明确地宣示他其所以辑印这些解《易》著作，即在于它们或"注《易》专务明理"㊻，或"宜辅传义"㊼，或能"发明《本义》"㊽，或"以朱子《本义》为宗"㊾。董楷之《正书》、蔡渊之《训解》、胡炳文之《通释》、胡一桂之《附录纂注》、董真卿之《会通》、熊良辅之《集成》等解《易》著作之所以被选中，即在于它们详细地解释阐述朱熹《周易本义》的意蕴。他说虽然这些著作各随其所得立言，人自为说，彼此有深浅详略之不同，但汇集起来，则"理象之粲然者，莫是过矣"㊿。他所说的"理"，是法则、规律，具体指的是朱熹等人企图永恒化的封建伦理纲常；"象"是象征，《周易》用卦、爻等符号象征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程颐《易传》，"一于言理，尽略象数"51；朱熹《周易本义》，则"推本圣人因卜筮教人之意"52，注重卦爻之象。即人们所说的"程主于玩辞，而朱主

于观象，一本于理，一尚其占”㊸。“理象粲然”，即将程朱两家学说融会贯通，视为浑然一体，并旗帜鲜明地将其发扬光大。

对程颐、朱熹没有作过传注的《尚书》、《春秋》等经书，纳兰性德在序跋中也强调要“一本伊川(指程颐)、晦庵(朱熹号)之意，遍览传说，折衷同异”㊹，“推明朱子之学”㊺。因此他特别推重“先引汉唐二孔氏(指西汉孔安国、唐朝孔颖达)，次收诸家传注，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指学承朱熹的真德秀)为归”的王梅浦《尚书纂传》㊻，以及程端学“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论，考证三传(指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胡氏(指胡瑗)得失”，“以发圣人经旨”的《春秋本义》㊼。

这些带有导向性质的序跋，是《通志堂经解》思想倾向最明显的表露；宣扬之情溢于言表，以至行诸笔端，对毫无新意之书也大加称赏。如董楷的《周易程朱氏说》，本来是程颐的《易传》、《遗书》和朱熹的《周易本义》、《文集》、《语类》合抄的大杂烩，既无新颖见解，又无学术价值可言，他却对之评价甚高，即表明他渴不择饮，急于阐扬程朱义理之学的心情了。

(二)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

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使传统的儒家学说演化得周密精微，哲理深邃而富有思辨色彩，但以理学的观点解释经书，常常离开经义而随意发挥，流于空疏迂阔，给读者造成思想混乱。到明朝中期以后，“心学”风行全国，使理学面临严重的危机。清朝统治者选择理学作为凝聚知识分子以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以确定全社会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就不能不提倡研习儒家经典，以弥补理学之不足。《通志堂经解》所要表达的主旨要义，也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思想，纳兰性德为其所辑解经著作所写的序跋，自然也贯穿这一旨趣，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倡导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了。

要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首先必须和宣扬程朱理学不无矛盾地承认理学之不足，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程颐、朱熹的局限性敢于正视，这在当时是要有些勇气的，表现了纳兰性德尊崇程朱而不迷信程朱的精神。他或引证他人称述表达己意，或率意直陈己见，在一些序跋中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时被视为“贤人”，一般人不敢提出异议的程颐、朱熹，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易经》的研究上。

纳兰性德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不可以一端尽也”㊽，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研究者虽夥，也不能说对《易经》的研究已经涓滴无遗，并且全都正确。程颐所著的《易传》“一于言理，尽略象数”，“于小象颇欠发明”㊾；“其举三百八十四爻，尽属之于人身，于作《易》之意有所未尽。且其间义理多伊川所自发，与经文隔膜，所以读者难于贯穿”。并引程颐自己的话说：“吾与此书，止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㊿。性德又在《三衢刘氏易数钩隐图序》中说，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和《洪范》(《尚书》篇名)两书来源的传说，自朱熹采取宋初道士陈抟之说，在《周易本义》中列出“河图”、“洛书”，认为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尚书·洪范》)之说出，“人不敢异议。然朱子之言曰：安在图之不可为书，书之不可为图？朱子盖未尝胶执己见也”(61)。这是他以程颐、朱熹的不敢自信，说明程朱理学时有困窘，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

鉴于程朱理学时有困窘，纳兰性德提出恢复古经原貌的主张，倡导“穷经”。和攻读《春秋》需“求笔削之旨，则知圣经不可以虚词立异，破碎牵合为说”(62)；探讨《诗经》需“寤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之上”(63)一样，探究《易经》也需“上求三圣(指伏羲、周文王、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下，和合诸儒之言于一堂之中”(64)。

在“穷经”和上求圣人之心的思想的指导下，纳兰性德不仅称赞胡一桂关于《易》、《诗》、

《书》、《春秋》、《周礼》、《仪礼》的论述"以复六经之旧"为指归⑥⑤,还特别指出,"古易"只有伏羲所画之卦,文王所演之象,周公所系之爻辞,"孔子十翼,本自为书后"。也就是说,相传孔子所作的"十翼"(据近人研究,出自战国或秦汉之际儒士之手,不是孔子的作品),是对《易经》的解释,并不是《易经》本文。可是人们为了便于习读,"分附彖、象传于各卦、爻之下,而古初之经遂乱而不可识"⑥⑥,宋代儒生吕祖谦等虽然有所更定,但人各不同,莫衷一是。因此他提出不可"因传以误经"⑥⑦的主张,主张不必拘泥后儒传注,推重"辨证古今之讹谬,订正书传之得失"⑥⑧的著作。对于《易经》,主张要使"古易复完"。因而他对"康节(邵雍号)、晦庵(朱熹字)少有所轻",但"分纬河图以溯伏羲画卦之由,错综河洛以定文王位卦之次","周公主之以取爻义,夫子主之以为彖传"的《大易辑说》评价相当高,说"其书平正稳审","其言至当"⑥⑨,原因即在于符合他恢复经书旧貌的主张。

纳兰性德在倡导恢复经书旧貌的同时,主张"明经者,必博观众家之说,折衷其是,以定一宗"⑦⓪。即使对朱熹的解说,也不可一味迷信,拘泥不变,而应"采摭诸家之说,与《本义》合者录之,即不合而有得于经旨者,亦备录以相发",最后要"折衷以己意"⑦①,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在《经解》中收入李衡集汉朝郑康成以下至宋代王安石、苏轼等近百家有关易义杂说的《周易义海撮要》;"论易间与朱子不同",但"深窥爻象之变","探颐钩深简严精切"的赵子钦《易说》⑦②;对程颐《易传》不满意,"凡伊川之隐而未发者,莫不尝其𥡴綮,尽其节目,融会贯通"的郑舜举《易翼传》⑦③等书。认为与朱熹在"河图"、"洛书"等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刘牧《易数钩隐图》等,也宜并存不废。表现了纳兰性德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对于《尚书》的研究,纳兰性德注重其中的《禹贡》,说中国疆域广大,若非亲身经历,难免有误,而"后世为传注者,乃欲以一己之见闻,举而核之,诚不能无误"。因此他特别推重"尽屏训传,独取经文",以经文为据"而后采历世载籍以证之"的程大昌《禹贡论》与《禹贡山川地理图》。认为《禹贡论》52篇论证长江、黄河、淮河、汉水、济水、黑水、弱水七大河的经流、故道等十分详细,历引各家成说而又指出其讹误不通之处,"凡诸儒舍经泥传注者,一一正之",并有8篇专论,论证黄河、汴水的水患。《禹贡山川地理图》则辨正历代山川郡县名称的改易等问题,虽然有"鸟鼠同穴为二山"之弊,但"弘肆淹雅,不诡随传注","援经证史,解驳尽致","抉隐正讹,有功学者",为"经说之杰"⑦③。

关于《春秋》的研究,纳兰性德认为宋儒"各自为传","不能得是非之公",因而"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久矣"。主张"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具体作法是:"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⑦④,折衷《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傍引曲证以析经义"⑦⑤,使《春秋》"褒贬自见"。他对胡瑗"时事激发,又多附会"⑦⑥非常不满,而特别推许孙明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说孙明复"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得经之义为多"⑦⑦。纳兰性德对《春秋集传释义》也很重视,说《春秋》记载240年间的治乱兴衰之故,仁义诈力之异,贤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为后人之鉴者不可胜数,"特经义不明而学术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夫以圣人垂训之经,反致有贻误后学之弊",而《春秋集传释义》有助于阐明经义,"不可不亟为表彰天下者也"。表彰的目的,在于此书"可以救胡氏之偏而发程朱所未尽",也就是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但他并不是不要理学,仍然要求包括阐释《春秋》在内的解经著作"一以程朱为断",参以开宋代学者怀疑经传风气的唐代经学家啖助、赵匡诸家的论说,"折衷己意",使"经义明而传之真伪、是非判如黑白"⑦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对蔡卞之为人口诛笔伐,认为"其人所谓投畀豺虎不食,投

异有北不受者”。但对他的《毛诗名物解》则不仅收入《通志堂经解》，而且评价甚高，说此书“贯穿经义，会通物理，颇有思致”⑲。既表现了性德不以人废言的博大胸怀，也说明他探求经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笃实学风，反映了他以经学济理学之不逮的思想倾向。

（三）表彰忠节

《通志堂经解》是阐释儒家经义之书，序跋之类的绍介文字对忠节等政治命题本来可以避开不谈；但纳兰性德其时是个留心时务的热血青年，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有报国业绩之人满怀敬意，在能发挥政治见解的地方，总是寄心笔端，直抒胸臆，将学术和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同时他编辑、校勘解经著作及序跋的写作，都是在徐乾学的指导下进行的，徐又是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早年过从甚密，顾炎武学以经世的思想，自然会有一部分曲折地反映到《经解》的序跋之中，即性德提倡的“大明经世之志”，“辅翊开代，修明礼乐”⑳。联系写作这些序跋的时间，就能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性德表彰忠节的现实意义。

《通志堂经解》的编辑、校勘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序跋的写作，当在稍后。其时正值“三藩之乱”，不仅吴三桂、耿精忠等藩王相继发动反清战争，清朝的王辅臣、孙延龄、郑蛟麟等将军，曹申吉、罗森、金光祖等督抚，也都接受吴三桂札付，附从叛乱。更有大量官吏持观望态度，不积极参与平叛战争。纳兰性德在这种情况下表彰忠节，倡导尽心王事，忠于君主，显然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尽快结束平叛战争，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至经济的发展。

基于这种思想，纳兰性德突破了一般序文于著书之人只举其立身大概，使后世读其书者稍得其本末，以为论世知人之据的常规，不仅大声疾呼：“《春秋》何义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伐恶而已！”“《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春秋》之义也”。“后世因传以误经”，“而尊王立教之本义迹遂失矣”㉑。呼吁学者们无事穿凿，阐明尊王黜霸，使“乱臣贼子惧”的经义，而且在凡能表彰忠节的地方，无不极力表彰，并且突破民族畛域，不论是对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

在《春秋五论序》中，纳兰性德记述了南宋末年吕大圭在漳州作官时，元兵突至，统兵官蒲寿庚投降，命令大圭署降笺，大圭不肯，变服逃至海岛，蒲寿庚又逼他作元朝之官，他不答应被害的事迹，然后感慨地说：“宋社既屋，人争北向，圭叔（吕大圭字）独不为诡随，甘走海岛，不惮以身膏斧钺，大节何凛凛也”㉒。表彰的是汉人忠于汉族建立的政权。而在《朱孟章诗疑问序》中，则缕陈了《诗疑问》的作者、元末人朱倬（字孟章）《元史》未为之立传，地方志亦仅书其科第、职官而不载其行事的情节。纳兰性德不辞辛劳，从《新安文献志》中搜检出明初汪仲鲁的《七哀辞》，才得知其“守节服义”的事迹，并不厌其烦地加以绍介。说朱倬为遂昌尹时，“寇由开化趋遂安”，吏卒逃散，朱倬不仅不走，反而“大书于座，有生为元臣，死为元鬼”等语，并且端坐公所以待。“寇尽焚廨舍，乃赴水死”㉓。讲的则是汉人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可见纳兰性德的忠节观，是突破民族界限的，并不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有所偏袒。

纳兰性德所写序跋的另一特点，是为了表彰忠节而借题发挥。如讲到朱子明的《诗传遗说》时，仅以十数字介绍子明，却离开绍介作者而大谈朱熹的曾孙朱浚娶宋理宗公主为妻，官两浙转运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宁时，朱浚与公主退到福州。福州知府王刚中献城，投降元军统帅阿剌罕。朱浚对公主说：“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手。”夫妇双双仰药而死。纳兰性德称赞“其事尤烈”，“执节守义，不愧乃祖”㉔。再如在《水村易镜序》中，纳兰性德对作者林光世介绍的十分简略，却又借题发挥，对林光世的曾祖林霆、高叔祖林冲之大加表彰，说“靖康

初，霆叔冲之被命使金，是时霆为乌江丞，三上书请代往，不报。冲之竟执节死。"又说"林氏世多忠节"，林冲之之子林郁任职福建茶司时，"遇乱，骂贼死"；林霆之兄林篪任镇江知府时，力攻奸臣蔡京等人，声名大震；林霆虽然与投降派代表人物秦桧为同科进士，却不附和议，并时常指责秦桧说："公何忍置二帝（指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万里外，博一宰相？"当地人称他们家为"忠义林氏"㊽。在讲到王梅浦《尚书纂书》时，纳兰性德又联系上了与作者及《尚书》毫无关系的文天祥，说"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谋兴复不遂，被执以死，其门人宾客，咸以忠义自奋；乡曲之士，多知自好"㊾。

这些借题发挥的论述，更加显豁地表明了纳兰性德特意表彰忠节的意图。这种意图贯穿于《通志堂经解》的选目和序跋之中，就形成了《经解》的另一个思想倾向。联系当时"三藩之乱"的现实情况，这一思想倾向显然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强大，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处和发展。

---

①《通志堂经解》卷首。

②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

③顾陈垿：《唐孙华传》。

④《清史稿》卷287，《揆叙传》。

⑤⑥《清史列传》卷12，《揆叙》。

⑦《清史稿》卷287，《阿灵阿传》。

⑧⑨陆九渊《象山全集》卷11、25。

⑩王守仁《传习录》中。

⑪黄宗羲《南雷文集》卷1。

⑫李颙《二曲集》卷12。

⑬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

⑭⑱顾炎武《日知录》卷7。

⑮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

⑯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

⑰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

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

⑳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33，《痛定罪言》概括顾炎武语。

㉑㉖《康熙起居注》第1册，29、114页。

㉒㉔㉘㉙《清圣祖实录》卷34、258、67。

㉓㉕《御制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㉗张英《笃素堂文集》卷5。

㉚㉜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序》。

㉛严元照《蕙榱杂记》。

㉝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

㉞徐乾学《纳兰君神道碑》。

㉟《通志堂集》附录，顾贞观祭文。

㊱《通志堂集》卷13，《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㊲《张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㊳㊹《诗传遗说序》。
㊴《王鲁斋诗疑序》。
㊵㊲㊿㊻㊾《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序》。
㊶《文公说易序》。
㊷㊼㊵㊾《周易玩辞序》。
㊸㊴《董氏周易程朱氏说序》。
㊹㊺《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启蒙易传合序》。
㊺㊽《周易启蒙通释序》。
㊻㊿㊿㊿《东谷郑先生易翼传序》。
㊾《石涧俞氏大易集说序》。
㊿㊿《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
㊿《周易参义序》。
㊿㊿《程积斋春秋序》。
㊿㊿㊿《赵氏春秋集传序》。
㊿㊿《梅浦王氏尚书纂传序》。
㊿㊿《王巽卿大易缉说序》。
㊿《三衢刘氏易数钩隐图序》。
㊿《雪山王氏诗总闻序》。
㊿《吴氏易图说序》。
㊿㊿《程泰之禹贡图论序》。
㊿《周易集成附录序》。
㊿《赵氏复斋易说序》。
㊿《春秋经筌序》。
㊿《刘公是春秋序》。
㊿《孙泰山春秋尊王发微序》。
㊿《毛诗名物解序》。
㊿《春秋五论序》。
㊿《朱孟章诗疑问序》。
㊿《水村易镜序》。